

中国现代史讲习班讲义

第一分册

中国现代史学会

1983年4月

中国现代史讲习班讲义第一分册

目 录

代前言	开垦中国现代史学领域中的处女地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在中国 现代史讲习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彭 明 (1)
第一讲	北洋军阀的兴亡	李 新 (6)
第二讲	国民党新军阀史	张同新 (18)
	第一章 三足鼎立的反动政权	(18)
	第二章 宁、汉、沪的纷争与合流	(37)
	第三章 蒋介石加紧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56)
	第四章 一九二九年的军阀大混战	(78)
	第五章 蒋、桂、阎、冯之战与北平扩大会议	(102)
	第六章 第二次反蒋联盟的起落	(128)
第三讲	汪伪政权	蔡德金 (164)
第四讲	简论军阀盛世才	许海生 (245)
第五讲	江浙“财团”析	黄逸平 (256)
第六讲	中国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全慰天 (267)

开垦中国现代史学术 领域中的处女地（代前言）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在中国现代史

讲习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 彭明

中国现代史学会首次创办的中国现代史讲习班，今天举行开学典礼。截止到目前，报到的学员已达一百余人，他们来自26个省市及部队院校，或科研机关，也有个别是在博物馆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有的来自北国边疆的黑龙江，有的来自南国边疆的两广，有的来自东海之滨的山东，有的来自东南沿海的福建，还有的来自祖国大西北的新疆。我代表中国现代史学会和讲习班领导小组，向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临行之前，黎澍同志也嘱我代他向同志们问好，祝同志们学习胜利，身体健康！

我们的讲习班今天所以能在西安这个无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或现代史上都有着历史意义的名城开办，是和西北大学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我代表中国现代史学会向西北大学学校领导，历史系的系领导，特别是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以及总务部门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来自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有的已是五十多岁，（最长者五十九岁），从事教学工作多年，已是饱学之士了。但同志们仍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到这里学习，有的是背着书籍来的。对同志们的这种学习精神，表示十分钦佩。当前，党的“十二大”刚刚开过，我们一定要借“十二大”这股东风，贯彻它所号召的加强学习的精神，把我们的讲习班办好。

我们的讲习班应该贯彻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呢？虽然我们把课程安排得比较多，时间填得比较满，但是我觉得应该以自学为主。中小学校以讲课为主，高等学校应以自学为主。就是讲课，也应是启发式，而不应是填鸭式。同志们大多是高等学校的教师，都有切身体会。因此，我们应以自学、研究为主。

同志们可能是带着教学的问题和难点来的，要求解答。有的青年同志可能是带着一张白纸来的，还不知怎样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有的同志虽然教学多年，但由于长期沿袭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框，不知如何才能开拓中国现代史的领域，因此想来收集一些资料和讲稿，以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多年从事教学的同志大多有展开一些科学研究的愿

望希望能从选题和资料上得到启发，有所收获。这些要求，都是完全合理的。

为了满足同志们的这些要求，我们学会尽了最大的努力，到全国主要的几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为大家聘请教师。同志们从教学计划上可以看到，其中很多都是在各个方面研究有素，学有专长的同志。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强调要以自学为主，因此，同志们在听课之余，还必须要拿出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来读书自学，不要只忙于课上记笔记，课下对笔记。为了有助于自学，我建议同志们课下定要及时阅读一些资料。跑跑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

为什么要强调自学呢？因为只有通过自学，才能咀嚼、消化别人所讲的东西，成为己有。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于思，毁于随。”一条是抓紧时间，一条是独立思考。清代诗人赵翼在《论诗》中有这样一首：“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意思也是说要有自己的见解。看来，古往今来的大学问家，都有这样的治学经验。“照本宣科”的教师只能起录音机的作用，而不能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用。

我们必须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虽然请的是各方面学有专长的教师，但同志们不应盲从，迷信。无论是在观点或材料上，都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互相研讨，教学相长。因此，我们的中国现代史讲习班，应该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班。必须指出中国现代史还没有形成什么科学的体系，它的各个领域大都还是一望无际的处女地，需要辛勤的园丁们，包括在座的同志们，一齐动手去开垦。我举几个例子，说说自己的看法，表明也想去处女地上抡几下镢头。目的是引导同志们开动脑筋，大家动手，一齐来开垦中国现代史学领域上的处女地。

先讲一个中国现代史的名称问题，就值得研究。

现在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中国现代史，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后的历史。这个名称合不合科学，从五十年代起就有争论，直到现在还有不同意见。

把历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等几个概念，不仅仅是为了区别时间的远近，而主要是为了区别不同的社会形态。古代史是奴隶社会史，中世纪史是封建社会史，近代史是资本主义社会史，现代史是社会主义社会史，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有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是从一八四〇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才结束。所以毛主席在《唯心史观的破产》等文章中，是把这一百〇九年的历史，统一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如他不止一次地说：“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

因此，在五十年代，当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这两个概念区别使用而把五四运动作为区别标志的时候，便有同志提出应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区别近代、现代的标志。即：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属于中国近代史，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应称中国现代史。如李新同志在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提纲时，便正式提出过这种意见并写有文章发表。在《通史》第一卷前言中也明确表示：

“本书写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是近代史的一部分，所以没有采取用现代史这个比较合乎习惯但却不合乎科学的名称。”这种近、现

代划分的意见，在史学界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例如，胡绳同志在最近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序言中说：“按社会的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个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但是，也还有不同意见。例如我们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论文中，便反对这种意见，在下面的交谈中也有不同意见。反对的意见主要强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性，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无产阶级是“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内容、时代发展的方向……”等等，这都是“五四”以后形成的。因此，中国现代史仍应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

有了不同意见，就可以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促使百家争鸣，深入钻研，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我举了中国现代史的名称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现代史学会要马上换招牌，中国现代史课程应该改名称。不，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还没有这个迫切性，而且改换课程名称，也要由教育部来规定。也可能中国现代史就这样习惯地叫下去，改不了啦！约定成俗为之宜。苏州车站前边有一小车站，地名叫浒墅关，据说从清初念成许墅关以后，就一直相沿下来这样念，老百姓成习惯了，你若念成浒墅关，他倒认为你念错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对各种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都要听取，并且要用头脑去思考。因此，我们欢迎大家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深入地探讨问题，用自学为主的方法，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再讲一个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对象问题。

我们高等学校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史教师，过去大都是党史或革命史的教师，学习时也是这样学的。教育部规定，历史系学习中国现代史就不必再学中共党史或革命史课（共同课）了。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中国现代史课和党史、革命史显得有些雷同。

我觉得党史、革命史、现代史是应该有各自的不同的研究对象的。

党史应该主要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的发展变化；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过程，即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要研究党的组织史，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应该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来研究的，但它所要着重说明的是理论问题，它虽然也是一门历史科学，但主要是作为一门政治理论学科而存在的。

革命史虽然也要着重阐明党的领导作用，但它的研究对象是着眼于各革命阶级、阶层以及各民族的人民群众，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各种具体活动，向三大敌人作战，以至取得胜利。如果说党史的侧重面在政治理论，而革命史的侧重面则在于政治斗争活动。（当然史和论应该是统一的，这里说的是侧重面）

中国现代史应该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它应该是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各种专史的综合。这种“综合”不是简单的剪辑和拼凑。经济史是历史的骨骼，政治史是历史的血肉，文化、思想史是历史的灵魂。现代史应该是这样一部有骨骼、有血肉、有灵魂的有机的整体。

如果这个意见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现代史学领域内待开垦的处女地就太广阔

了。

例如，关于经济史的研究，我国搞现代史的人就很少进行。而不懂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史的基础”。（《共产党宣言》一八八三年德文版序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二三二页）又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点，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特点和阶段性，以及每次大的侵略活动，即每次事实的发生，都有着它的深刻的经济背景的。

封建主义为什么那样顽固，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复辟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封建军阀怎么产生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什么那么顽固，从“五四”以来搞了那么多年，也没有搞净。所有这一切，不研究封建经济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也是说不清楚的。我们常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里的半封建，显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百分之五十。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分解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但在相当时间内，也只是在一定地区内起了分解作用。广大地区内恐怕还是封建经济为主。毛主席在一九二八年写《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军阀割据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内部原因就是“地方性农业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两三千年了，都是如此。从《天河配》到《天仙配》，都是男耕女织。从《兄妹开荒》到《夫妻识字》也还是男耕女织。我们只有具体深刻的研究这些经济上的特点，才能够说明许多政治上的现象。为什么会形成反革命的军阀割据，又为什么也能够形成革命的红色根据地，这都是和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特点分不开的。

中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资产阶级怎样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又各有着怎样的特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首先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式，只能两步走，而不能一步走。所有这些，也只有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才能深刻说明。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恩选集》第二卷，第八三页）

再如，关于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我国搞现代史的人也很少进行。有的高等院校虽然开了政治思想史的课，但是有关这方面的教材和专著，也不多见。有些专题研究虽然开展得比较深入，但是发展也很不平衡，五四时期的较多，而以后各个时期的则显得太少。就是五四时期，也还有许多空白点，如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和破产，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但是我们还缺乏如实的反映。五四时期如此，以后各个时期文化、思想的空白点就更多了。如二战时期的政治思潮起伏较大，方面很广，代表人物也多，但是我们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宋庆龄同志逝世时，我们说他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这四方面的言行都表现在什么地方？她是怎样由爱国主义发展到国际主义，由民主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请中国现代史的教师给回答一下。很显然，如果不系统研读她的著作，不认真

研究她的历史，是回答不出来的。《宋庆龄选集》出版很久了，有几个同志认真地读过一遍？

这里说的还只是政治思想史，至于文化思想史，哲学思想史……等等，我们的现代史教师就更少触及了。当然，从整个中国通史来看，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都是薄弱的，解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除了蔡尚思同志在一九七九年出了一本《中国文化史要论》外，没有一部系统的文化史著作，至于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研究，就更加薄弱了。庞朴同志提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见《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第八版），我很同意。我们也应该提出：应该注意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研究。

又如，关于政治史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了。但是，我们也只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这条线的研究，或者是说按照这条线的体系略加几个专题而已，至于国民党史、民主党派史，以至帝国主义侵华史，我们都还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我们只说共产党抗战，而一点不提国民党也进行了抗战，这就不全面。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的台儿庄会战，还是很激烈的。国民党宣传说：取得了歼灭三万人的战果，可能有所夸大。但是，日本的资料也说：合第十、第五两个师团计战死2367人，负伤9615人（三月至五月，包括徐州作战在内），可见战果也很不小。你说国民党从来没有抗过战，就很难说服人家。国民党抗战将士牺牲的也很不少。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四日，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湖北枣阳（襄樊附近）南方与日军遭遇，十六日在宜城南瓜店被敌包围，部属自凌晨打到晚上，全部伤亡，张本人身中五弹，最后自杀身亡。现在北京还有一个张自忠路，我们人民大学的一部分教工宿舍就在张自忠路一号。因此，说国民党一点没有进行过抗战，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以前我们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今后应该加以注意。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有它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我们应该如实地表述出来，不隐恶，也不虚美。总之，还是要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对民主党派史的研究，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本全面、翔实的各个民主党派史。有的高等院校和有的机关在专门研究。我们希望他们早日出成果，早日看到他们的大作。此外还有军事史、少数民族史、妇女运动史等等，也都还没有看到有专著出版。

以上是讲的各方面专史的情况，至于应该在各专史研究基础上的综合性通史，就更谈不上。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主席是在一九四一年提出的任务，四十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交卷。

因此，我在这里提出了“开垦中国现代史学领域中的处女地”的这个题目。我们学习班的教学计划 and 所请来各方面的学有专长的同志也是为了引导大家从以上几个方面开垦处女地的教师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向大家报告，希望大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看资料，想问题，互相补充，互相发展。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成为辛勤的拓荒者，成为中国现代史方面的专家。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学习胜利！

第一讲 北洋军阀的兴亡

李 新

今天我来讲一讲中国的近代军阀。所谓近代军阀，主要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此外，护国战争以后，中国南方曾出现脱离北洋势力的西南军阀，当然也属于近代军阀的范畴。现在首先讲北洋军阀。

一、北洋军阀产生的历史背景 及其某些特点

有的同志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的湘淮军作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开端。我看这种说法值得研究。所谓军阀，最基本的条件是军队为个人所私有，而曾、左、李、胡及辛亥革命以前的袁世凯还都不具备这一点。曾国藩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后，主动解散了大部分湘军。而清政府对曾、左、胡、李的湘淮军也始终有调动权。当然，曾、李等人用封建主义的宗法观念控制湘淮军，是有某种程度的军阀性，但不完全具备军阀的形态，即辛亥革命以前的袁世凯也不完全具备军阀的形态。袁比曾、李等更注重收罗、培养人才，因此，他对北洋军的控制比曾、李对湘淮军是更进了一步。但是，当清政府因其权势过人，而要夺取军权时，袁世凯也无可奈何。1907年清政府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归陆军部直接管辖，一下子就收回北洋军大半。1908年11月西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摄政王载沣又借口袁世凯有“足疾”将其罢黜，赶回河南。因此，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这十六年，只能说是北洋军阀的孕育时期。

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可称北洋军阀形成阶段。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无力应付，袁世凯东山再起。不仅控制了北洋军，并且进而控制了清政府，不久又就任临时大总统，夺取了中央政权。这一时期，北洋军才完全表现出是袁氏的私军。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昌起义促成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形成。当然，这种历史结果并非发起和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愿意的，主要是客观形势使然，下面还要讲到这一问题。

北洋军阀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分不开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本主

义有了发展：不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大大增加，而且在它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论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比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当然要优越得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集中，它所产生的政治力量要相对的大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当然也要影响到意识形态。不过在中国，至到“五四”以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殖民化的资本主义，固然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但它对中国是一种新东西，这种新的因素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北洋军阀的出现就是其重大影响之一。

第二，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分散的个体经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占着压倒的比例。此外，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有雄厚的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精神条件。革命前，资产阶级作了一些思想启蒙的工作，但远远不够。所以后来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这个运动，实际上起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补课的作用。而且，我认为，这一课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补完。

封建势力依然严重存在，而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这就是北洋军阀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北洋军阀就具有很多中国古代军阀所不可能具有的特点。

一、采用外国兵制。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廷深感原有军队，无论八旗兵、绿营兵，还是湘淮军都不足依恃，开始效法外国兵制训练新兵。北洋军自其前身新建陆军时代，就仿效德国的兵制操练。以后袁世凯又聘用大批日本教官使北洋军西洋、东洋兵制兼备。1903年袁世凯又参照德军制改革北洋军建制，在军中依次设立军、镇、协、标、营、队、排、棚的建制，即后来称的军、师、旅、团、营、连、排。北洋军不仅编制完全效法帝国主义国家，兵器也大量购自外洋，早在镇压太平国时，曾、李、胡、左即称羨外国“船坚炮利”，开始购置外国军火，并陆续举办一些军事工业。袁世凯继承曾、李的传统，北洋军兵器全部近代化，而且基本上购自外洋。北洋军阀也曾举办一些工厂自造军火，不过因为造出来的兵器质量总不过关，主要地还是依靠进口，依赖外国的武器装备，始终是北洋军阀的特点。当然，西南军阀，乃至国民党新军阀也都如此。

由于采用帝国主义国家的装备和军制，北洋军阀也就不能不学习西方的军事思想。随着西方国家军事思想的输入，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当然也会在北洋军人产生一些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北洋统治者对此是极力抵制的。北洋军阀治军的主要思想还是封建化建观念：忠、孝、节、义等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那一套。

二、北洋军阀的财政来源已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前，封建军阀的军队饷源主要依靠田赋等税收。湘淮军也基本如此。北洋军则大大不同了。其饷源大宗往来自关税、盐税，和官办企业的收入（铁路、轮船局等），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交通部与地方军阀争吵不休，多由地方军阀截留铁路收入充作军饷而引起。从北洋军阀开始发行公债，这是以往统治者所没有的搜刮方式。北洋军阀另一重要的财源是向帝国主义借款。

北洋军阀不仅在军事上依靠帝国主义，而且在经济上，财政上也要依靠帝国主义，

这就为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干予和侵略中国提供了方便。北洋军阀大都卖国。他们为了吞并它人，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就要无休止地扩军。而养兵是需要钱的，养的兵越多，需要的钱也就越多。军阀自己解决不了，怎么办呢，非借外债不行。而要借外债就要拿出中国的主权作交换条件。所以北洋军阀，特别是控制中央政权的大军阀，都是卖国求荣者。卖国者是必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抗的，这就是北洋军阀最终复灭的根本原因。

三、北洋军的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它劳苦群众，当然也有无业游民。总之，北洋军阀实行募兵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征兵办法也被称为“志愿兵”制。而当时中国是谈不上什么志愿兵的，破产的小生产者没有活路，投军大多是为了找地方吃饭，所谓“吃粮当兵”。我们四川人把当兵的就叫做“粮子”。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各种征兵制：有过府兵制，也有过募兵制，在清代，除了八旗兵外，绿营兵与湘淮军也都是募来的。与绿营兵和湘淮军比较，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要略胜一筹。袁世凯募兵一向比较严格。要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者才能入选。而且，北洋军的待遇也比较高些。所以北洋军开始战斗力较强，后来的皖系、直系招兵就差多了，直系曾把在临城搞劫车案的孙美瑶匪伙收编入伍。奉系更是大量招收兵痞、流氓，收编土匪。因为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就是“胡子”出身，二十年代以后，一会儿土匪招安为军，一会儿军队散而为匪，于是军匪难分，成为普遍现象。

四、北洋军阀不仅不能统一中国，而且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从根本上讲，当时分散的个体经济决定了北洋军阀不可能造成真正统一的民族国家。袁世凯一度形式上统一中国。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二次革命”失败以前，国民党在南方还有很大力量。而在北方，割据势力一直隐然存在，张作霖、阎锡山，以及一些内蒙王公对袁世凯虽然表示拥戴，但也仅仅是拥戴而已。他们的军队袁世凯是不能随意调动，他们的地盘也是不容袁氏染指。至于外蒙和西藏曾发展到公开闹“独立”的地步。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割据的局面更加严重。南方有西南军阀的纷起，北方有直、皖系军阀的分裂和斗争。1920年直系和皖系公开摊牌，爆发了大规模战争。直皖战后，军阀混战连年不已。

造成北洋军阀之间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的原因何在？值得深入研究。毛主席指出，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原因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割政策。诚然，这二点是主要原因，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分割政策和小农经济这两个条件早已具备，为什么清代后期没有割据出现呢？为什么呢？我以为，北洋集团未能形成一个坚固的军事团体也应当是一个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共和国还是君主立宪国，军队思想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资产阶级对军人思想训练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热爱所谓的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军事团体是坚固的，德国、日本、英国等无不如此。当然，在无产阶级看来，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狭隘的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曾经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祸害。而封建统治者教育军队则是提倡忠君爱国，比资产阶级还要落后得多。袁世凯开始编练北洋军时，编有“劝兵歌”一首，歌词说“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事实上，封建统治者

提倡的忠君与热爱民族国家是矛盾的。皇帝即国家。爱国就是爱皇帝一姓。但封建王朝的皇帝毕竟还可以做为偶像。清灭亡以后，这个偶像也没有了。袁世凯上台后，大力提倡忠于北洋团体，实际上是忠于他袁世凯个人。而袁的统治崩溃后，北洋集团分裂的局面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皖系军人只忠于段；直系以冯国璋为首，直系军人只膺服冯。奉系则效忠张作霖，晋系则效忠阎锡山……。北洋集团失却中心，从此以后，北洋军阀倒戈反向的事件也就层出不穷。这种倒戈现象在清代和袁世凯统治前期都很少。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北洋军阀用封建伦理观念教育军人已不能形成为坚固的军事团体了。

后来国民党新军阀有所不同，蒋介石的黄埔系形成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军事团体。黄埔军事团体的形成与国民都统治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尽管这种经济充满了买办性，并很快为四大家族所垄断，但他还是为黄埔系军官团体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点以后述及国民党新军阀时再展开来讲。

综上所述，北洋军阀对外卖国，对内残民，横征暴敛，并不断地制造内战，搞得各阶层人民生活 and 生命都没有保障，怨声载道。由此可见，1924年以后国民革命的兴起，北洋军阀的彻底覆灭是必然的。

以上概述了北洋军阀产生的背景及其若干特点。下面再将曾经掌握或控制过北京政府的几个北洋大军阀及其集团作一大略的分析。

二、袁世凯的兴亡

北洋军阀的始祖是袁世凯。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际能够东山再起不是偶然的。以往人们总强调袁世凯是靠搞阴谋诡计发迹。不错，袁是一个大阴谋家。但袁世凯之所以能兴起也并非仅仅靠阴谋诡计。首先，袁世凯在清末实行所谓“新政”中，是卓有成绩的。袁在编练新兵、建立巡警、创办官商企业、改革教育等诸项“新政”中，都颇有建树。这种“新政”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袁世凯是靠办“新政”赢得声望的，特别是在统治阶层中。另一个“新政”很有成绩的大官僚是张之洞，他对袁氏很赏识，所以在临死时向清廷力荐袁世凯“才堪大用”。

开始我们就已经讲到，清朝皇族对袁世凯的权势迅速膨胀是怀有戒心的，所以1908年清廷借故夺了袁的权，把他赶回家。但是，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清政府无力自保，只好又请出袁世凯。革命形势逼迫清室依靠北洋军。而在当时清朝大官僚中，只有袁世凯能完全控制北洋军，确是“非袁莫属”了。

此外，帝国主义者也全力支持袁世凯登台，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革命胜利，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早在李鸿章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就寄望于袁世凯。当昔的工具清政府气数已尽时，帝国主义者选中袁世凯作他们新的代理人是很自然的。武昌起义爆发后，英帝国主义穿针引线，为袁世凯登台创造条件。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力主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但也已看清，即实行君主立宪，实权也要落到袁世凯手中。

“非袁莫属”的舆论不仅来自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统治阶层；而且还来自革命阵营。

当时革命阵营的共同斗争目标就是：“反满”，在其它方面则政见分歧。而且组织上也四分五裂，章太炎一派就公开反对孙中山。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数革命党人但求推翻清朝统治就行了，只要是汉人，不管谁出来领导都可以。真正坚决反满又反袁的革命党，是很少的。甚至连黄兴这样的领袖人物，从武汉保卫战中感到袁世凯拥有很大实力，要实行共和，还得靠袁世凯，只要袁世凯能促成共和，即可把总统职位让给他。当时孙中山本人也迁就了这个意见。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只不过是一个看守总统而已。这从孙中山的就职誓词中也可以看出来。

袁世凯夺得了总统的职位，又逼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掌握了中央政权，北洋军阀最后形成了。这一点前面也已讲到。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斗争虽未停止，但在一段时间内减弱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革命党人受到袁世凯的蒙蔽。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一面裁减南方的革命军队，挖革命派的墙角；一面又大施骗术把（孙中山）黄（兴）请到北京。每当孙中山向袁世凯讲话时，袁总是随口附合，甚至孙中山说要在中国实行“耕者有其田”袁也不加思索，连声赞同。孙中山上了袁的当，向袁表示“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袁还假意大诉党派竞争之苦，表示想隐退。袁世凯作伪的本领确是登峰造极。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封建政治统治术固然害了无数的人民，但也不知害了多少个统治者。袁世凯并不是最后一个。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沉重的包袱啊！

袁世凯的虚伪表演，增加了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的幻想。民初政党林立，大小近二十。尽管袁世凯利用梁启超、汤化龙等削弱国民党，国民党在国会中仍然取得胜利。正当很多人还陶醉在民主宪政的幻想中时，袁世凯却指使人暗杀了国民党予定的内阁总理宋教仁。

“宋案”真相大白后，革命党人震动。孙中山十分愤激，力主讨伐。但在这个紧要关头，国民党内部意见纷纭，黄兴主张“法律解决”。国民党尚在争论不休，袁世凯已经动手，罢免了李烈均等南方四督，并挥大军进攻江西等地。革命党人仓促上阵，进行抵抗。但双方力量悬殊，革命党人很快就一败涂地。

“二次革命”的失败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即是说，在中国尚不具备实行宋教仁所追求的那种议会民主制度的客观条件。辛亥革命中，中国农村变动不大。广大农民根本不能理解和接受资产阶级的议会、政党、内阁之类西方玩意儿。“宋案”发生刺激城市人民，特别是知识界，使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对袁世凯感到失望，但对农民影响甚微。封建时代，广大农民渴望的就是“好皇帝”，“轻徭薄赋”，过太平日子。恩格斯曾经说过：小生产者总是崇拜“权威”，希望“权威”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袁世凯对南方稍加用兵，即获胜利是与农民厌战情绪有关的。袁世凯装作“救世主”的样子，大倡“国家不堪再乱”，要“统一”才能太平等，对人民特别是对农民有很大的欺骗性。武昌起义时，各地商农踊跃向革命军捐饷，而讨袁战事起后，多数商民冷淡，甚至加以抵制，都与人民厌战情绪有关。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为讨袁失败发生激烈争论：什么“军事解决”“法律解决”，“先发制人”，“后发制人”，吵得不可开交。“法律解决”固然不

可能，“军事解决”也必然失败，不是也打了一下吗？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到“二次革命”时期的致命错误是没有抓住时机，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触及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南京临时政府不仅不敢发动农民，而且反对和镇压农民起来革命。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也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国民党的纲领很少革命性，比同盟会时代退步了。特别是宋教仁将许多官僚政客拉入国民党，使革命党人更加脱离人民。革命党人没有为人民办多少好事，因而关键时刻也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由于客观条件根本上不成熟，而革命党人主观上又犯了大错误，所以“二次革命”失败了。

但也需要指出，宋教仁等人在封建势力异常强大，而新的革命力量——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议会民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尽管这种主张在当时按客观条件不能实现，我们也应当给予应有的肯定。以前，我们对于宋教仁鼓吹议会民主的批评有过不当之处。

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并没有立即解散国会，这并不是因为国会俯首听命，引起他的好感，而是因为他还需要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名正言顺的进行统治。“二次革命”前，国民党议员因有南方几省作后盾，还敢于对袁世凯进行一点监督。“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七零八落，孙毓筠等为袁世凯收买，成为破坏国民党的别动队，“稳健派”也不敢说话了。袁世凯乘机利用汤（化龙）、梁（启超）的进步党，再加上“公民团”打手的武力威胁，强迫议会把自己选为大总统。这时的国会、政党实际上已成为袁氏手中的工具和玩物。

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后，顾盼自雄，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袁世凯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封建式的人物。在他的头脑里，西方民主政治本是异端邪说，只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才是天经地义的。他认为，辛亥革命“败坏法度，殄灭伦理，”使“二千年文物之邦”几乎毁灭。尽管他在总统的形式下，已经完全获得专制皇帝那样的权力，但他仍不满足，还想尝尝当皇帝的滋味。袁世凯的帝王思想由来已久，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他就向亲信流露过成就帝王之业的念头。

象袁世凯这样充满封建帝王思想的陈腐人物，对辛亥革命及其在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当然无法理解。他没有看到，也不愿看到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民主主义思潮不断高涨，逐渐成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袁世凯对中国人民觉悟程度的错误估计，加速了自己的败亡。君主专制早已大失民心，而这种失去人心的制度已经被抛进历史垃圾堆，袁世凯却偏要把它拣起来，还要人们重新顶礼膜拜，怎么能不碰壁呢？无论中外历史，一种偶像只要倒了以后，绝难再立。袁世凯如果不作皇帝梦，大概他的统治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他的阶级地位、个人思想和反动的政治逻辑决定了他必然要走向帝制自为道路。

袁世凯要当皇帝，必须首先取得日本的支持。本来，袁世凯与日本人关系并不亲密，自甲午战争开始，双方就互相猜忌。但当时袁世凯的后台英国正和德国在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他只得求助于日本。而日本政府也看破了这一点，乘机要挟，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开始，袁世凯也嫌日本人要价太高，但为了早日当皇帝，也

就不顾一切的承认了。（只有第五项中会办警察、兵工厂，内地主要铁路建筑权一律归日本等内容未承认）。历来，卖国最失人心，决无好下场。清朝皇帝就是这样垮台的。卖国必亡，这是一条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一致反对。袁世凯的统治基础彻底动摇了。

袁世凯帝制自为，不仅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了北洋集团上层的动荡。对袁世凯称帝，他手下两员最重要的将领段祺瑞和冯国璋都不以为然，前者称病以示反对后者是敷衍搪塞，不肯出力。段、冯不肯支持袁世凯也不是偶然的。自1913年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就认为对他威胁最大的已不是逃亡国外的革命党人，而是握有军权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1915年6月，袁世称帝在即，冯国璋特地赶到北京探听消息，没有得到袁的一句真话。袁世凯的虚伪只能使他更加孤立。本来他作梦想早日登基，面南称帝，却还要假造什么“国民代表大会”，搞什么“国体投票”，而他接到“推戴书”后还要再三推辞，最后装作迫不得已，才接受民意当皇帝。特别是他一手策划的“筹安会”，更遭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唾弃。这一系列丑恶的表演，只能使人们更加厌恶，更加认清他二面三刀，食言而肥的寡廉鲜耻的真面目。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最早出来揭露袁氏称帝的野心。1914年就有革命党人撰写题为：《袁世凯皇帝梦》的文章，警告国人，抨击袁氏。1915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军，派人到山东、陕西、上海等地发起反袁武装斗争。但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分裂以及中华革命军的武装斗争脱离群众，没有与农民自发反抗斗争相结合，影响较小。结果，反对袁搞帝制运动的领导权反而被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夺走。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因打手印宣誓问题与黄兴等闹翻，因此党员很少，实际上只有一个小宗派。资产阶级政党搞宣誓效忠个人这一套，是中国落后的帮会传统的表现。梁启超反袁是不得已而为之，进步党人与袁世凯本在一条船上，袁世凯称帝使他们感到危险。为避免一同落水，梁启超曾写信苦劝袁世凯：“不要以千金之躯，当众矢之的，舍盘石之安，就虎尾之危。”但袁执迷不悟，梁启超只得抛开他，利用其弟子蔡锷在云南的势力，发起护国战争。护国战争爆发后，北洋集团进一步瓦解，冯国璋等公然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不穿上龙袍不死心。结果在全国人民的咒骂声中，洪宪帝制八十三天便彻底垮台，他本人也随之呜呼。

由地方军阀要求掌握中央政权，掌握中央政权之后又妄图当皇帝或总统，这便是中国近代军阀心目中一条最为理想的道路。在这迷途上蹉跎的岂止袁世凯一人？前车覆，后车继，一部中华民国的历史充满了这样可笑的篇章。

皖系军阀的盛衰

从1916年袁世凯毙命至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北京政府基本上为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所把持，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皖系军阀统治时期。

段祺瑞的兴起也不是偶然的，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中势力大，声望著者有三人：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但徐世昌是文人出身，后来虽也结交了一批北洋武夫，但毕

竟没有自己控制的军队，没有直接带过兵。面对段祺瑞、冯国璋虎视眈眈，他自知不是对手，退居河南乡村。冯国璋与段祺瑞一样，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提拔起来的大将，当时坐镇南京，领兵二万，颇有实力。但是，他在云南讨袁战争兴起后，以调解人自居，企图独树一帜，遭到全国各方面反对。而不久袁氏毙命，无须他居中调节，他的影响就减弱了。再者，就人品而论，冯爱财如命，遇事又少谋寡断，与段祺瑞相比，大为逊色。段祺瑞曾留学德国，见识较广，遇事颇有主见。而且，他注重自己的声望，不收贿赂，在北洋军阀中堪称佼佼者。当然，个人的品质和性格不是主要的因素，段能继袁之后，成为把持北京政府的大军阀，主要原因在于：

一、有自己的派系和军队。段在清末多次出任各军官学堂的总办，督办，北洋六镇高中级军官多出自他的门下。辛亥革命以后，北洋陆军迅速膨胀，段借任陆军总长职务之便，将大批亲信，如靳云鹏、徐树铮、付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人安插到重要职位上，造成以自己为首的军人集团。二、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捞到政治资本。护国战争的结果仅限于推翻了洪宪帝制，中国除恢复了共和国的形式外，北京政府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仍然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段祺瑞并非不想当总统，只是因为当时南方有护国军存在；北洋军阀内部又矛盾重重，冯国璋等又对他不服气；他因而不敢作那样的尝试。当时的形势迫使他把黎元洪依法摆在总统的位子上，而自己则以国务总理身份把持北京政府的实权。

段祺瑞控制中央政权的能力较袁世凯当年相差甚远。北京政权一开始就不稳定。国会恢复后，国民党议员纷纷回北京，并很快与黎元洪结合起来，与段祺瑞皖系军阀相抗衡。而直系军阀冯国璋也乘机混水摸鱼，与国民党系的一些议员暗通款曲。段内阁刚刚组成，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就与支持黎元洪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大闹内阁，以至徐世昌进京调解，将两人同时去职。

由此“府院之争”愈演愈烈，1917年春因参战案达到高潮。从表面上看，段祺瑞主张参战无可厚非。因为当时欧洲战争形势已趋明朗，美国参战后，德奥一方明显处于劣势，当时中国如参战至少可乘机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对民族国家都有好处。而反对参战的政客，大多唯美国马首是瞻，开始美国主张中国参战，他们随声附合；以后美国因考虑中国参战对日本更为有利，又反对中国参战，这些人又180度大转变，也改变态度反对参战。所以，从表面上看，段祺瑞坚决主张参战，在政治上站得住脚。但实际上，段祺瑞主张参战，内中包藏着比那些翻云复雨的政客更加丑恶的祸心。他欲借参战名，进一步投靠日本，借款扩军，排除异己，征服南方，统一中国，走的是袁世凯卖国独裁的老路。因此，1917年5月，段祺瑞唆使“公民团”包围国会，企图强迫国会通过参战案。结果事与愿违，激起全国舆论谴责。黎元洪乘机将段免职。

段祺瑞当然不能听任黎元洪把自己赶下台，立即煽动“督军团”叛乱，并阴谋在天津另组政府。正值此际，张勋复辟发生，更为段祺瑞重掌政权铺平道路。段祺瑞借“保护共和”为名，率兵打败张勋。段祺瑞重掌北京政府以后，以“再造共和”之功，从政治军事上加强了独裁专制统治。他与研究系勾结，抛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旧国会，另组御用参议院。同时，他放手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大借款，其中仅西龟三经办的款项即

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远远超过整个袁世凯统治时期向日本借款的总额。这些借款几乎都用于打内战和编练段家军（即参战军）。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遭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强烈反抗。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但由于孙中山自己并无军队，只能依托于滇、桂军阀，结果不久却被排挤。孙中山领导护法的失败，再次表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军阀势力，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强大得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软弱，因而其政治代表人物及政党，不敢发动工农，说明它已经无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

面对西南势力的崛起和直系军阀的分裂抗礼，段祺瑞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1918年5月，段政府与日本密秘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这项协立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兵，并指挥中国军队。这一“引狼入室”的卖国协定，遭到全国激烈反对，各界人士，纷纷通电责问。

在大借款和编练参战军同时，段祺瑞又利用卖国借款，收买政客，制造“安福国会”。这时，冯国璋已任满下台，他便利用“安福国会”，把老官僚徐世昌推为总统，借其利用。前面已经指出，卖国、独裁不得人心，必遭失败。段祺瑞自以为已经组成了俯首听命的政权。殊不知靠卖国独裁过日子的段祺瑞，已逐渐暴露了他反动的本质，由盛而衰，并接近垮台了。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高涨的革命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引起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的矛头，虽然是直接对着曹、章、陆三个卖国贼。但很多人已经认清，（例如李大钊、陈独秀等）、曹、章、陆的后台是段祺瑞。段氏不倒，中国无望。“五四”运动以后，段祺瑞控制的卖国政府，完全陷于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在全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浪潮中，直、皖矛盾尖锐化。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一触即溃，顷刻瓦解。皖系的失败固然有其军事指挥失算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它在政治上被指为卖国，而直系吴佩孚却打扮成爱国将军，以爱国攻卖国，胜负之数本已决定，何况吴佩孚比段祺瑞，特别是比徐树铮在军事上又高明得多呢。

四、直系军阀的兴衰

直系军阀的兴起正是利用了皖系军阀的衰落。当皖系倒行逆施，肆无忌惮地进行卖国勾当的时候，直系的实力人物吴佩孚以“爱国军人”的姿态出现，抓住皖系的辫子不放，大肆攻击蛊惑人心，博得了不少人的支持。直系军阀一面反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内战政策，迎合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一面反对皖系军阀亲日媚外的卖国政策，利用全国人民爱国救亡的热情，赢得了舆论的支持；不少人把希望寄托于直系特别是“爱国将军”吴佩孚的身上。他这时也就乘势大谈其军人的天职是“救国救民”，甚至于还高谈“劳功神圣”，允许共产党人在其统治范围内的京汉、陇海等铁路沿线组织工会。所有

这些进步的伪装，都提高了他的威望。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都同吴搞过统一战线。这也不奇怪，因为皖系控制的中央政权同日本勾结，企图共同出兵远东，与苏联为敌，而直系又恰好是皖系的政敌，敌人的敌人很自然地容易成为同盟者。

吴佩孚以“儒将”自命，既注意练兵，又干预政治，他网罗了一批知识分子作为幕僚，又聘请了一些外国顾问，表现出学贯中西，颇有要在中国实行现代政治的样子。从当时的报刊上可以看出，吴不但是鼎鼎大名，而且是“众望所归”，连康有为那样的人物，对吴也推崇备至，认为中国可以靠吴佩孚来“中兴”。再加上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吹，一时间似乎要挽救中国出于危亡，非吴莫属。由此可见，直系军阀的兴起和取代皖系军阀的统治，绝不是偶然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

直系军队本来就比较精锐，尤其是吴佩孚所部训练有素，能征惯战，取得过多次胜利，而其装备因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亦较为新式。段祺瑞虽长陆军多年，但直接掌握的军队不多。因此他加意训练参战军（后称边防军），作为依靠的基本队伍，并委派亲信徐树铮主持编练。但徐树铮并非战将，虽有日本提供的较为现代化的装备，与吴的军队相比，究非对手。

直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优势，同时又采取了南联孙、北联奉的策略，使皖系在一九二〇年的直皖战争中两面受敌，归于失败。直系从此取得了控制中央政权的地位。

直系军阀的得势，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密切关系。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皖系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得势。大战结束后，西方势力卷土重来，特别是美国极力压制日本，使其不能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华盛顿会议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召开的。这次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其目的即在孤立日本。皖系的后台受挫，直系的后台增强，这也是直胜皖败的原因之一。当然，皖系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它的反动政策在国内丧尽人心。

直系在上台之前反对武力统一，上台后又走上其前辈军阀的老路，以中央政权的名义，消灭异己势力，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一切非直系的反对，纷纷以“民主”，“自治”“联省自治”以及其他各种美名相对抗。奉系在直皖战争中曾是直系的盟友，战胜皖系后，它觉得分配不均，在组阁等问题上不断与直系发生摩擦，开始酝酿着新的战争。孙、皖、奉的反直“三角同盟”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违背了人民的和平愿望，随着直系的不断发动战争，人民对它的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个众人瞩目的吴佩孚，一旦当权，即不顾其“劳工神圣”的前言，一再压制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惨案”，彻底撕破了这个反动军阀的伪装，暴露了他那副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工人运动虽然遭到挫折，吴佩孚也因此大失人心。人心向背是决定胜负的基本原因之一，人心一失，其灭亡之期也就不远了。

直系的首领曹锟，是一个昏聩粗野，愚昧无知的封建军阀，他也想效法其前辈，过一过国家元首瘾。当皇帝是太不合时宜了，就想当总统。在他看来，皇帝也好，总统也好，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罢了。只要登上宝座，身为一国之雄长，便可以所欲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像曹锟这样最落后的军阀，头脑里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民主观念，更